

红学专家共话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学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15年是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红楼梦学会于11月11日,联合举办了“《红楼梦大辞典》修订启动仪式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学出版座谈会”。红学专家李希凡、刘世德、胡文彬、吕启祥、陈熙中、张庆善、杜春耕、任少东、李晶,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老编辑刘文忠、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等出席活动。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主持。200多年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论著、文章不计其数,并形成了相关学科——“红学”。众多的红学著作中,初版于1990年的《红楼梦大辞典》,集结了冯其庸、李希凡、邓庆佑、吕启祥、胡文彬、顾平旦、陶建基等知名红学专家共同编撰,兼具知识性、学术性和

工具性,堪称集大成式的《红楼梦》百科辞典。

《红楼梦大辞典》出版后,成为学者、读者研习、欣赏《红楼梦》的必备工具书之一,深受欢迎。2010年,《红楼梦大辞典》曾出版增订本,而今天,著作方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启动再次修订工作,将为学界和业界以及广大红学爱好者带来一部更加完备的《红楼梦》百科工具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红学出版重镇,自1953年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标点整理的《红楼梦》,累计销售各种整理本《红楼梦》近700万册。其中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初版于1982年的《红楼梦》,迄今已销售460万套,成为当下最严谨、最普及的版本。人文社发展历史上,除出版面向大众读者的《红楼梦》校注外,还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红楼梦》影印版本,以及大量产生重要影响的红学研究著作。

(柳生)

馆藏资源深度发掘受出版企业关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刘立志

公共馆藏挖掘与私人珍藏开发

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种类繁多,领域庞杂。出版企业对某类馆藏资源的深入挖掘,很可能会显示出这家单位近段时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和规划。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办负责人张家珍在交流中向记者透露,该社正在考古学出版领域与各博物馆研究所保持密切联系,充分挖掘各地的馆藏资源,这也是该社这几年以及今后“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努力方向,代表其出版特色,即在考古出土文献方面的开拓。这些项目包括《山东省博物馆甲骨集》、《北京大学藏秦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图录》、《俄藏龟兹艺术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墨拓珍本丛编”、“上海博物馆藏有铭青铜器周亚32近代金石学家尺牘校注系列丛书”等。

记者在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学术图书编辑室主任赵艳交流时,她也介绍了不少广西师大社在这方面的探索。比如“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这是广东佛山西樵镇镇政府出资的一个大型的乡邦文献性质的丛书汇编,许多内容是从广东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扫描出版,计划出版300种,目前已出版50多种。又如“广州图书馆馆藏书目”丛书,主要是发掘广州图书馆馆藏的一些珍稀文献,影印出版。已出版的品种有:《广州图书馆藏可居室文献图录》、《李宗颀日记手稿》、《南海李应鸿先生行述》、《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手札》、《南窗笔记》、《广州图书馆藏仪清室所集广东印谱提要》等。

谈到具体的合作,赵艳认为出版社秉持的原则是:以微利运营,获得更多的珍稀文献资源,并获得更多优质作者资源。“因为此类馆藏文献的整理和印制,对成书品相、规格等要求比较高,制作成本居高不下,只能通过微利甚至不盈利的模式先把书做好。”重要的是,随着丛书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版社逐渐挖掘出越来越多的珍稀文献资源和优质作者资源。“比如‘广州图书馆藏珍本丛刊’中的‘可居室藏书系列’,我们同著名古文版本学家、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及书法家王贵忱结缘;通过‘仪清室藏书系列’,我们同青年收藏家、广东文献研究者、专栏作家、书画家、电视台主持人、古典文献学博士梁基永结缘。随着丛书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更多的图书馆和收藏家们会愿意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对馆藏或者私家珍藏的挖掘会更加深入。”

贴合研究热点挖掘馆藏种类

出版企业着眼于挖掘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除了契合自身传统的出版领域,还往往和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学者研究的所需相匹配,这是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企业行动

广西师大社“文化+旅游”探索有新进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桂林阅秀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上市。该公司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成员之一。该公司成立之初,就立志“把文化融入旅游,提高旅游品质,促进旅游升级”作为公司的发展方向。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该公司文化创意、理念和努力同时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并于今年10月3日在

由于受到文化产业政策的扶持,我国的博物馆数量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截至2014年,各类博物馆的数量是4510座,2009~2013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1.46%。与之相仿,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也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截至2014年底,共有公共图书馆3117座。其近些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57%。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不难想见,未来新建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数量将稳步上升。另一方面,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大量涌现,也为出版企业提供了新的契机,许多单位开始着眼于挖掘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这些馆藏资源经过整理成为出版资源,内容既有传统的古典文献,也有诸如经济档案、美术藏品、音乐唱片等新的出版领域。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再利用或再出版,业已成为了一股潮流,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关注。



以经济史研究为例,近几年来,关于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有了很大拓展,部门经济史、专题经济史、区域经济史、民族经济史、海洋社会经济学勃兴,改变了原来偏颇的研究视角。伴随着经济史研究的发展,之前不少经济史方面的档案、材料也被出版社从各大图书馆中挖掘出来,重新出版面世。

前不久,中华书局与首都博物馆合作出版了“首都博物馆藏北京地区经济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系列丛书”,该系列的《窑契与经济合同文书(精)》收录了首都博物馆、门头沟区博物馆藏的200份窑契与经济合同文书,对研究中国经济史,尤其是京畿地区的经济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基础材料。又如,中华书局还充分挖掘南京图书馆馆藏,规划了“南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金融期刊汇编”,目前面世的《银行周报(全200册)》。该套书的编辑说,“此次收录《银行周报》自1917年创刊至1950年停刊全部1635期的杂志及增刊5种。《银行周报》每期都提供了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市场行情、大量国内外金融统计资料及重要参考文章,也是当前学界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乃至全国金融历史的重要文献。”

相似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代坤告诉记者,作为今年的主题出版物之一,该社推出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档案汇编》等。这套书汇集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所藏的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档案。其主要内容为劳工就劳经过报告书、附表(包括各事业场概要、死亡劳工诊断书等)、附属书类(包括中国劳工赴日契约书等)。这批劳工档案极为珍贵,属国内首次公开,是日本奴役中国劳工最直接的证据,是劳工史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文献。又如,该社的《济南“五三”惨案史料汇编》,是对山东省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开发,收录了1928年5月至1949年10月前出版和发布的关于济南“五三”惨案的文献,包括中文图书、期刊25种,英文图书1种,档案资料13份,展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

艺术藏品开发延展出版内涵

不同于上述提到的一些专业和学术出版单位挖掘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像美术、音乐等领域的出版机构也围绕自身的出版需要,充分开发相近的馆藏资源,这在业内也已成为一股潮流。

故宫出版社的代表产品《故宫日历》即是该社对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充分利用。《故宫日历》中除了收入故宫藏品,还将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茂陵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等机构和个人的相关藏品,都编入日历之中。尽可能呈现最精彩的艺术品,全面展现古代文化。这一切,都使日历的表现形式与内涵得以大大延展提升。

安徽出版集团也和故宫博物院合作,陆续推出重点项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

声音：音乐馆藏如何再利用？

在音乐出版方面,一些出版单位也开始对各类馆藏资源加以整理出版。像老唱片、旧录音等音乐出版资源就时常为人所忽视,但其开发潜力巨大。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背靠上海图书馆,其除收藏大量的图书、报刊和科技资料,还拥有丰富的音乐文献资源。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上海图书馆就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唱片资料专藏组(唱片组),开展唱片整理、研究工作。以粗纹、密纹为主的老唱片至今已累计藏有20万余张,来源更涵盖将自家收藏无偿捐赠给上图的越剧名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评弹表演艺术家蒋玉泉等。在上图的馆藏唱片中,外国音乐约占2/3。中文唱片则以戏曲为主,仅京剧唱片就有6000余种,其中包括谭鑫培以60岁高龄首次由巴黎百代公司灌制的唱片《洪洋洞》,最早的中国歌剧唱片《兄妹开荒》等。作为一家公共图书馆,上图在音乐文献的整理、编目和数字化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让更多人认识、接触、

目录,最能体现一本科技书的逻辑结构,而逻辑结构是否严谨往往事关一本科技书的成败。目前,出版社的来稿多为自投稿,这种稿件一般都为完稿,编辑并未参与稿件框架的商讨。所以,这类稿件在审稿时对项目进行研读就更为必要了。

逻辑框架不严谨。需要对目录整体内容进行把握,方能察觉。

例如水利水电社来稿《蚕桑生产技术集成》一书中目录(节选)(见图1)。

通过审读目录,可以发现第三、十一章和第八、十二章的内容似有相通之处。继而在通读稿件后,我又重点阅读了此四章的内容,接着可以看出其中第三、八章为一般性的栽培养殖技术,而第十一、十二章为河南省的优化养殖技术,但是两者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审读过后,我在审读记录中,建议将第三、十一章以及第八、十二章,进行合并或紧密编排,以使文章的逻辑顺序更加明晰,经责任编辑与作者沟通协调,他们认同了这一提议,并根据具体情况对书稿的章节编排进行了调整。

标题中的概念内涵不清、外延不当。这一问题是最容易通过审读目录来发现的。比如水利水电社来稿《水库管理手册》

使用这些宝贵的音乐文献,在出版形态方面,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采用纸质版和数字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在读者对象方面,以专业读者为主,大众读者为辅。

又如,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以修编民国时期音乐文献为契机,每年开展相关主题的论坛及工作坊,已相继完成“萧友梅手稿计划”、“李四光手稿计划”、“丁善德手稿计划”等民国时期重要音乐文献的整理。上图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历时五年编纂完成的《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上音馆藏为基础,深入考究其他图书馆、博物馆历史资料,编排分为图书、乐谱、唱片、期刊4类,其中唱片部分收录了百代、百歌、宝利等25家唱片公司的1600余张唱片资料。今后上音馆的工作人员将根据这个目录按图索骥把里面的资料都整理成数字资料,建立数据库,原件修复后作永久密封保存等,至少要用10年时间。

业者论坛

目录：科技图书编辑的审稿起点

丛艳姿(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审稿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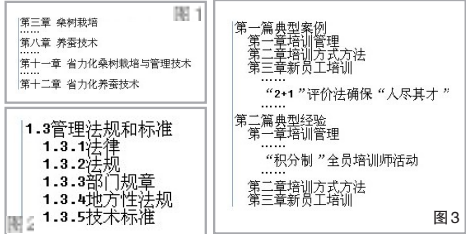


图1 目录(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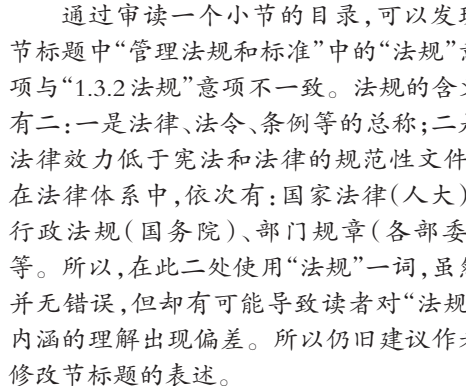


图3 目录(节选)

一书中的目录(节选)(见图2)。

通过审读一个小节的目录,可以发现

节标题中“管理法规和标准”中的“法规”意

项与“1.3.2法规”意项不一致。法规的含义

有二:一是法律、法令、条例等的总称;二是

法律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在

法律体系内,依次有:国家法律(人大)、行

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各部委)等。所以,在此二处使用“法规”一词,虽然

并无错误,但却有可能导致读者对“法规”

内涵的理解出现偏差。所以仍旧建议作者修

改节标题的表述。

层级关系含混。如果说,标题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不当、不明确可以通过修改标题来弥补不足,那么层级关系含混的修改就比较复杂了。

如水利水电社来稿《电网企业培训工

作典型案例与经验》有篇章目录(节选)(见图3)。

通过审读篇章目录,可知全书是通过选取典型案例和已有经验对“培训管理”“培训方式方法”“新员工培训”等三个方面内容安排全书结构的。然而,这种划分却使得全书层级逻辑含混,因为三章的标题并非完全独立,而有边际不清、互相交叉的情况,如“‘2+1’评价法确保‘人尽其才’”这一篇内容,既可以划入“新员工培训”中,也可以放进“培训方式方法”里。目录中“‘积分制’全员培训系列活动”也存在相同问题。之所以造成这种混乱,是因为作者在进行章一级标题的划分时,没有明晰逻辑关系,使得所写内容一旦涉及多个领域时,其所属便会引起混淆。鉴于此,我在审稿记录中建议作者对全书的篇目进行梳理,选取合理视角重新进行编排。

本周观察

日前,东方出版社在京举办“龚鹏程作品系列”出版座谈会。《龚鹏程作品集》包括《鹏程问道》、《国学十五讲》、《中国文学史》、《华人社会学笔记》等近20册,涵盖了龚鹏程近几十年来的主要著作。出版座谈会上,乐黛云、温如敏等学者回忆了与龚鹏程的交往故事。

在交流过程中,龚鹏程透过自身作品,向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和为学感悟。以此次推出的《鹏程问道》为例,龚鹏程提到这是此前《四十自述》的修订本,“正如题目所示,它是在讲我求学问道之过程,少年如诗,用思成学,而渐渐历事涉世,遂参与历史,故分为诗、思、事、史四卷。彷徨在人生途上的有志求学问者,不妨一看。”

此次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四海游思录》则是近20年龚鹏程在大陆行走的思想实录。龚鹏程表示,“我早岁致力于学术;三十左右参与政治,希望经世致用;四十至五十主要在台湾办大学;五十后移居大陆复兴中华文化;各有阶段。《四海游思录》是我来大陆以后的记录。文字记录,当然如网捞水,只剩了点生活上的水珠,供人缅怀。但十几年以来,四处行旅,讲学伴随着嬉游,志业混杂了人情,哀乐无端。个人之悲欢与当今社会之观察揉合在一起,或许也是值得参考的。”

会议上,龚鹏程还谈到,近30年来大陆变化之大可谓“恍如隔世”。其变化,是巨大且快速的,因此概括与总结十分困难。幅员又广,区域差异极大,所以也并不能笼统地说出与台湾的异同。“在这方面,我主张做较细致的分项比较,甫出版的《华人社会学笔记》及即将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笔记》都在提倡这种分区分项、注意内部多元异质性的研究。”

此外,东方出版社新出版的图书还包括《龚鹏程讲儒》、《儒门修正法要》等著作,立体分析了儒学的各个侧面,并谈到了儒家面临的危机。龚鹏程也借此表达了自己对新儒家的看法,其认为港台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及其弟子辈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曾昭旭、王邦雄等人,是近60年间最重要的中国哲学诠释群体。其成果是80年代以后大陆重新接续传统文化血脉的基础,因此是现今仍不可忽视或跳过的。同时,他们的学术关怀在于如何会通中西文化,如何与现代民主自由体制结合,所以目前对各界学人还还具有参考价值。“我很尊重他们,也很肯定他们,对于眼前某些不太了解他们就急着想摆脱或超越之人,颇不以为然。”

龚鹏程携手东方社问道学术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刘立志